

长江中游儒学研究丛书

宋明时期 湖北的儒学研究

郭齐勇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明时期 湖北的儒学研究

郭齐勇/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明时期湖北的儒学研究 / 郭齐勇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61-3308-8

I. ①宋… II. ①郭… III. ①儒学—研究—中国—宋代②儒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934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 昂
责任校对 张成刚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373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洛学、湖湘学、闽学与荆楚之地	(14)
第一节 二程与荆楚之地	(14)
第二节 湖湘学派的胡宏、张栻与荆楚之地	(17)
第三节 闽学与洛学、湖湘学	(27)
第二章 谢良佐与洛学南传	(40)
第一节 受学程门	(40)
第二节 发明师说	(44)
第三节 传承洛学	(58)
第三章 朱震及其易学思想	(66)
第一节 朱震生平与传世著作	(66)
第二节 朱震易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71)
第三节 易学之最高范畴：太极	(81)
第四节 易学之变化观	(92)
第五节 余论	(108)
第四章 郭雍的易学思想	(115)
第一节 以《易》明“道”的易学史观	(119)
第二节 《易》所言“三才”之道	(134)
第三节 “圣人”与“以《易》洗心”	(146)
第四节 过揲与挂扚的辩论	(162)
第五章 陆九渊在湖北	(185)
第一节 荆门政绩的哲学思考	(185)

第二节 荆门时期的哲学思想·····	(192)
第六章 李承箕兄弟的思想·····	(203)
第一节 李承箕及其与陈献章的交往·····	(203)
第二节 李承箕的“天”“人”内外贯通·····	(212)
第三节 李承芳的批判精神·····	(233)
第七章 陈士元的经学思想·····	(238)
第一节 五经学·····	(240)
第二节 《论语》《孟子》研究·····	(254)
第三节 思想的学派属性及其流变·····	(260)
第八章 耿定向及其思想·····	(265)
第一节 耿定向生平·····	(265)
第二节 学为“圣人”·····	(290)
第三节 “圣学”与“异端”·····	(304)
第九章 郝敬哲学思想探析·····	(318)
第一节 郝敬其人其书·····	(320)
第二节 理气论·····	(329)
第三节 心性论·····	(347)
第四节 知行观·····	(364)
第五节 经学思想·····	(382)
第六节 小结·····	(393)
第十章 瞿九思及其著作·····	(400)
第一节 《孔庙礼乐考》·····	(401)
第二节 《乐经以俟录》与《万历武功录》·····	(415)
第十一章 胡承诺的实学思想·····	(422)
第一节 “实学”辨析·····	(423)
第二节 论制度与人·····	(428)
第三节 心性修养论·····	(434)
结束语·····	(443)
参考文献·····	(447)

绪 论

一

北宋后期的中国因特殊的政治、民族问题，文化中心逐渐南移，至南宋偏安，长江中下游流域更成为当时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随着元朝大一统帝国的再次建立，南宋理学通过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向北中国及整个东北亚推进。有明一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重心仍在长江流域，并通过长江流域向岭南珠江流域、向南中国及东南亚推进。明代王阳明及其后学成为主潮。明末清初最有活力的儒家学者亦是生于斯长于斯。及至清代，中国文化中心才逐移到北方。宋元明时期的儒学，特别是理学，就地域而言，最盛的当然是长江流域，且这一地区由于是地处中国联结南北地区的枢纽地带，遂成为沟通北方与南方的文化信息的平台。

北宋以降，尤其南渡之后，江西与两湖地区率先成为当时人文荟萃之地。长江中游儒学群体因而崛起。究其崛起，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其中，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自我认同是内在缘由。本课题成员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段与地域具有原创性的学者、学派，特别是他们在互动之中，在宋明理学基本范畴、思想框架的营造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是其理论中心。因此这一地区学者的道德实践论最具有鲜明的性格。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宋元明理学的研究，偏重于“洛学”、

“关学”与“闽学”，缺乏对长江中游地区学术的重视；偏重于北宋五子、南宋朱子、陆子及明代王阳明等一流人物，不太重视与这些人物相交往的其他人物或这些人物之外的人物。实际上，恰恰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处在不同层次的思想人物促成了濂、洛、关、闽、新、蜀、浙、岭南、湖湘诸学派、思潮的互动，乃至成就了宋明理学。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宋明理学养成于长江中游地区。本项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本课题着重探讨儒释道三教合流与这一地域的背景、基础的关系；这一地域的学者的学术取向、重心、学风与洛学、关学、闽学及岭南学的差异与互动；长江中游宋明学术的思想特质。

本项研究在方法学上力图结合历史、方志、年谱、书院史、讲学活动，用思想史考古的方式，研究某一特殊的地域中的特殊的学术集团及其相互的关系。我们重视社会政事与教育师道，重视长江中游学人的全面参与和积极贡献，重视精英人物与其门生、追随者及民间社会的关系，使研究的对象逐步下移，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大。这对于现今的宋明儒学研究是一个突破。

本项研究突破了的难题有：一，从思想脉络和学术传承上弄清楚宋元明时期湖南、江西、湖北地区儒家代表人物、主要儒学集团间的联系与区别；二，论述宋明时期湖南、江西、湖北儒学与关学、洛学、闽学、浙学、岭南学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与区别；三，重视宋明儒学知识人跨地域的频繁交往引起的思想争辩与扩散，由此讨论宋明儒学的同质性与地域性问题；四，巨细无遗地研讨湖湘学的发展细节，弄清胡安国、胡宏、张栻及其门生乃至王夫之的内在理路；五，关注现行哲学史、思想史界未曾或较少关注的，然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如胡安国、谢良佐、胡宪、胡寅、李承芳、李承箕、胡居仁、郭雍、陈士元、陈九川、郝敬、瞿九思、胡承诺等人的思想、著述。

二

要研究宋元明时期长江中游的儒学，尤其是湖北的儒学，不能不对整个的宋元明学术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在北宋前期，儒学显现出非常博大的状态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按钱穆的说法，那个时期的儒学在教育修养、政治治平、经史之学和文章子集之学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①

宋学兴起，首先重视的是教育与师道，于是兴办民间书院和官私学校。胡瑗和孙复是体现人格修养和教育精神的教育家和大师。胡瑗办学设经义和治事两斋，经义重通才、学理，治事重专家、实习（如边防、水利等）。胡瑗、孙复、石介、徐积是宋学精神的最早代表，继韩愈之后，重开尊师重道的传统，重建儒家道统。孙、石是北方派的代表，胡、徐则是南方派的代表。他们在道德理想、经世济民、实际专业知识方面有全方位的展开。他们的总体主张是既成德又立功。内圣外王的两面撑开，无疑是儒学的根本。

宋学的博大又体现在政治与治平方面。范仲淹是初期宋学的第一位政治家，开启了当时士大夫关心政治的风尚，其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张对以后的改革运动影响很大。范氏是庆历新政的中坚。他是政治人物，但首先是儒家学者、大师，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都是他的学生，张载也是在他的教导下才潜心向学的。欧阳修在这场改革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石介、李觏也积极鼓动、支持。第二位有影响的人物是王安石，是熙宁变法的挂帅人物，对王霸之辨有全新的阐释。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结合

^① 以下参见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版，第30～32页。本《绪论》参考了钱氏这一著作。

心术与政术，使内圣（正心修身）与外王（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这其实是宋初儒学的必然发展。当然王安石其人其政其学都有鲜明的个性特色。第三位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是司马光，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则废除了王安石新法。

在经学方面，宋儒开疑经之先河，而特别创发新义。他们的疑经是否有坚实的根据，看来还需考察。从今天的考古发掘来看，新出土的简帛佚籍已证明：欧阳修对《易传》的怀疑，刘恕、苏辙对《周礼》的怀疑，至少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但疑经而创发新的义理，则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特点。宋儒都强调通经致用，比汉儒更有气魄。胡瑗的《周易》学、《洪范》学，孙复的《春秋》学，李觏的《周官》学，都突破了汉儒的束缚。刘敞长于《春秋》学，开宋儒评汉儒之先声。王荆公早年对《易》学的发挥，中年主持《三经新义》（《诗》、《书》、《礼》），对《周官》的发挥，特别是在他主政时在科举考试制度上的改革，废诗赋取士，以《诗》、《书》、《易》、《周礼》、《礼记》等儒经作为科考主要内容，且不限于注疏，这些做法对宋学的影响更是根本性的。《周礼》成为科考之科目，《论语》、《孟子》被提到“经”的高度，扩大了儒家经学研习的范围。^①在此时，《中庸》也被凸显出来，司马温公尤重发挥《中庸》之“中和”思想。三苏父子之蜀学，对《易》、《书》二经的诠释，都有新见。

在史学方面，欧阳修的《五代史》、《唐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有刘攽的汉史、范祖禹的唐史、刘恕的上古及五代史等，都很卓越。宋儒擅长史论，其史学水平已超过汉唐。

在文章子集之学方面，承唐韩愈古文运动之余韵，自欧阳修之后，古文大兴，王安石、苏轼都是一代巨匠。宋儒把文学与儒

^① 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本《绪论》参考了漆氏的这一著作。

术结合了起来，这与汉代之辞赋学、唐代之文选学都不一样。这使文学有了钢骨，有了底蕴。北宋诸儒对先秦诸子学的贡献甚大。钱穆先生说，如果说汉儒是经学之儒，宋儒则回到子学之儒。其实他们不仅怀疑经书，也怀疑子书。这种怀疑，有些很有意义，有的也根据不足。说他们是子学之儒，是说他们有子学精神，创发性很强，思想活跃，生机勃勃。

按漆侠的看法，宋仁宗、英宗之际，即嘉祐治平年间（一〇五六～一〇六七年），宋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新学、司马光（温公）学、苏氏蜀学和以洛学（程颢、程颐）、关学（张载）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这四大派都卷入了由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年）王安石变法而激起的政治斗争。荆公学派与温公学派在政治上、思想学术上都是对立的，蜀学与洛学在政治上一致反对变法，在学术上与荆公学派也有不同，然蜀、洛二派彼此间在思想学术上也有不少分歧。在我们看来，学术思想上有分歧有争论就有生命，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并育而不相害，正是中国文化可大可久的基础。

按钱穆先生的看法，北宋初期诸儒，其中有教育家，有政治家，有文学家，有诗人，有史学家，有经学家，有卫道的志士，有社会活动家，有策士，有道士，有居士，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五光十色，而又元气淋漓。这是宋学初兴的气象。但他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和目标，“即为重整中国旧传统，再建立人文社会、政治、教育之理论中心，把私人生活与群众生活再组合上一条线。换言之，即是重兴儒学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这可以说是远从南北朝、隋唐以来学术思想史上一大变动”^①。必须注意到这个时期那些人物的多方面的努力与探究，才能了解以后宋学的真正渊源与真正精神。

^①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版，第30页。

中期宋学是宋代理学的创立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即为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兄弟。其下则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吕大钧、吕大临等。吕大临初学于张载，后从学于二程，与谢、杨、游并称程门四大弟子。

中期宋学与初期宋学不同，不再是博大宽广的儒学，稍显单纯、专一，因而广博不足，精深有余。其原因是庆历、熙宁两次变法的失败，儒家们在政治领域施展才干的主观欲望、客观可能都受到限制。中期儒学即理学便集中在宇宙论、人生论、心性论上作深入探讨，对佛道二教作内在性批评、扬弃，建构了具有真正哲学意义的理学，深化了儒家思想学术，把儒学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此期间的宋学，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都不如前一时期的宋学。在文体上，他们学习禅宗，讲学多用语录体。

钱穆在总结北宋这两个时期儒学发展关系及特点时指出：“初期诸儒多方面的大活动，要到中期才有结晶，有归宿。画龙点睛，点在中期。初期画成了一条龙，要待中期诸儒替他们点睛。点上睛，那条龙始全身有活气。”^① 钱穆所谓的初期诸儒画了一条龙，是指宋初儒学学术上的多方面表现，包括政治治平、经史博古、文章子集和教育师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形成了一种新气象。但它们是平铺展开的，广博有余而深度不足，没有把儒学的基本精神凸显出来，也不能抵抗佛教的挑战。而北宋中期兴起的理学，突出了宇宙论和心性论，在北宋初期儒家画的这条龙上“点”上睛，使北宋学术有了重点。这对反对并消化佛学，使学术向纵深发展有积极意义。

南渡之后，宋学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南宋儒学阶段。南宋儒学其实就是理学。其中有朱熹学派，胡安国、胡宏、张栻学派，

^①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版，第32页。

陆象山学派，吕东莱学派与陈亮、叶适学派等。朱子闽学、胡张湖湘学、陆氏心学、吕氏婺学、陈叶功利学等相互之间有争论辩难，在学问路径、价值取向上有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但不应当把这些分歧绝对化。南宋诸儒是在同一思想架构下运作的，其思想背景、思想预设有一致性。即使是朱熹与永康永嘉事功派之间，也是大前提相同下的分歧。当然，这些矛盾与分歧表明理学内部有自身的张力。至于朱陆的异同，更是大同而小异了。朱熹不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是宋学的集大成者，宋学的最终成型即在于朱子。朱熹在政事治道、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的各方面，回复到北宋初期儒家的全面性，克服了第二期宋学只重心性修养功夫，不重政务、经史、文章及其他的片面性。有研究者认为，理学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空疏，是与社会现实脱节的。我们不认为理学（心性之学）就是空疏的，讲理学就是与社会实践脱节。宋明时期的民间社会其空间很大，理学知识分子在民间自由讲学，关心民间疾苦，参与社会政事，批评时政，以社会清流维系着世道人心，成为活的政治与道德资源。理学的形成有各方面的原因和基础，至少与宋初儒学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理学的兴起是儒学面临分崩离析的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佛教的挑战时的一种文化自觉，也是社会力量、社会精神文化资源配置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尤其是，理学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保存下来，发扬光大，并下移到民间社会。

元代是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的时代，理学也正式成为官方哲学。南宋理宗端平二年（一二三五年），蒙古军队攻陷德安（今安陆，属湖北，治所在今汉阳），俘获理学家、安陆人赵复（江汉先生），姚枢将其救出，送至燕京。赵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姚，姚据以修纂成《五经要语》，广为刊行，于是北方学者皆得程朱之书而尊信之。姚枢等为赵复建“太极书院”，赵复遂开北方书院讲授程朱理学之风。与赵复一道到北方

授徒讲儒学的还有湖北应城人硯弥坚（字伯固）。在北方，因姚枢、郝经、许衡、刘因等朝野知识分子的推动，程朱理学得以广为流行。吴澄、许谦等南方理学家又与许衡、刘因等呼应，使陆学也在江西、浙东一带流传。到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考试，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式，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占据支配地位的学说。元代理学实际成为元代的立国之本。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维系了中华文化的大统，促进了文化与民族的融合。^①

宋元之际的赵复，是长江流域学者把理学传入北方的代表。元初的吴澄（一二四九～一三三三年），抚州崇仁人，与许衡齐名，有“南吴北许”之称。其学兼综理学与心学，认为“道之为道具于心，岂有外心而求道者哉”。明初学者吴与弼号康斋（一三九一～一四六九年），亦抚州崇仁人，仍然继承程朱学，坚持“敬义夹持，诚明两进”，其高足有胡居仁、陈献章。吴与弼与薛瑄号称南北两大儒。胡居仁号敬斋（一四三四～一四八三年），江西余干人，亦程朱学。陈献章则把理学传到岭南珠江流域，并自创新说。这些学者对湖北地区有甚深影响。

明代的思想学术，沿着朱陆异同的问题而发展。明代初期大儒有：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等。明初理学家是朱子学向阳明学发展过程中的中间环节。明代中期最著名的思想家当推王守仁（阳明），与其同时代的还有湛若水、罗钦顺等。王与罗、湛在学术界成三足鼎立之势。晚期明学是阳明后学的勃兴。从浙中王门至泰州学派至罗汝芳，风格迥异，各有特色，其中预伏着理学内在变化的原因。理学的殿军是东林学派与刘宗周。明末诸遗老虽沿着理学的思想框架，然已有了更多的新思

^① 参见《中国儒学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1～682页。

想、新气象。现当代有名望的学者梁启超、侯外庐至萧萧父，大体上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视为与理学不同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当然，梁、侯、萧先生等并没有割断宋明学术与清学的联系，尤其肯定明清之际众多的思想家们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扬弃。明末清初的大家，北方的孙奇逢、李颀、傅山、颜元等，南方的黄宗羲、陈确、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张履祥、陆世仪等，都是杰出人物。钱穆先生认为，这些人物表面上虽然沿袭前轨，但精神上已另辟新径。由于宋元明儒学七百年所积累的思想资源无比深厚，若无这些积累，则不可能产生清初这些思想大师。故而理学在清代仍然有生命力。

从思想史来说，宋元明儒学（或简称宋学）自北宋中期以降，主要是理学，而理学的高峰是朱熹与王阳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与“阳明学”不仅在中国发展传播，同时也在东亚等地广为传播，日本、韩国、越南都有不少具有独创性的理学家，都有自己的理学家群体或自己的“朱子学”、“阳明学”。

在宋学特别是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长江流域孕育了不少卓越的思想家与学者。不少儒学群体在这里崛起。有的大家（如朱子）虽以福建为主要活动领域，但其一生的政事、学术交流与切磋，却与长江中下游流域有着不解之缘。此处仅仅就朱子与南康、潭州的关系来加以说明：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年），朱子受命“知南康军”（“军”相当于“州”、“府”，军事要地设“军”）。在两年郡守任期间，朱子有不少善政。他整顿“军学”、“县学”，兴教善俗，亲到军学讲授儒学，又发掘地方文化资源与传统，立濂溪祠，建白鹿洞书院，邀陆九渊讲学。朱子振兴了南康官府与民间的文教事业，提扬了理学的价值意识，尤以白鹿洞书院的重建，创制了书院的办学理念、目标与规模，对官学发出了挑战与冲击。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年），朱子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前来听讲者多达千人，盛况空前。朱子此

行在湖南游学达两个月，广泛接触胡宏后学与诸湖湘学人。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六十五岁的朱子以湖南路转运使知潭州。为了重振张栻在世时岳麓书院之雄风，朱子重新修复了岳麓书院，并扩大规模，把他在白鹿洞书院时所制定的学规作为岳麓书院的院规，不仅聘请自己的学生、醴陵黎贵臣和张栻的学生郑贡生主事，还亲自授课，从而使岳麓书院成了荆楚地区的学术重镇。此外，朱子修屈原祠、濂州祠，重建湘西精舍等，使理学在荆楚之地得以广泛传播。

朱子学正是通过长江流域走向全中国乃至辐射全世界的。由于长江流域的学者与洛学、关学、闽学、岭南学的学人互动交融，创造并丰富了宋学与理学。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长江流域孕育了宋学与理学，宋学与理学则提升了长江文化。

三

在这一背景下，再来谈宋明时期湖北的儒学。

较之唐与五代，北宋行政区域设置，固今湖北地区在州县制基础上有些新变化，设立了管辖州县的“路”。如荆湖南路（治所潭州，今长沙）、荆湖北路（治所江陵，今荆州）、京西南路（治所襄州，今襄阳）、淮南西路（治所寿州）等。两湖平原（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大部分划归荆湖北路，小部分则分别隶属于京西南路（辖长寿等两县）、荆湖南路（辖益阳等十二县）和淮南西路（辖黄陂等三县）。两湖平原县以上政区，属荆湖北路的有汉阳军（辖汉阳等两县）、鄂州（辖江夏等七县）、江陵府（辖江陵等八县）、复州（辖景陵等两县）、安州（辖安陆等五县，宣和初升安州为德安府）、荆门军（辖长林等两县）、朗州（辖武陵等四县，大中祥符五年改朗州为鼎州，乾道元年升鼎州为常德府）、澧州（辖澧阳等四县）、岳州（辖巴陵等四县）等。其中，

朗州、澧州、岳州等数县，今属湖南省。南宋行政区划基本如上，无多大变化。^①

宋代湖北地跨五路，计有三府、十二州、四军、三监（工业区设监），以荆湖北路、京西南路为主。荆湖北路有江陵、德安二府十州，其中鄂、复、峡、归四州属湖北。京西南路有襄阳一府七州一军，其中随、金、房、均、郢五州与光化军属湖北。此外，夔州路的施州，江南西路的兴国军（今阳新县），淮西南路的蕲州、黄州亦属湖北。南宋时湖北变成前线，与金国辖区接壤，襄阳、荆州、武昌成为战略军事要地。在襄阳与荆州之间的荆门军更成为前线战略要地。^②

元代设行省，湖广行省治所鄂州，今湖北大部与河南南阳地区则属河南江北行省。明代置湖广行省，将南阳划归河南行省。明湖广布政使司的辖区，约略与今之湖北、湖南两省地方相当。洪武年间，又有“道”的设置，其后屡有更置。至嘉靖年间，湖广布政使司七道，这即成为明朝湖广境内的基本格局。其中，属今湖北省的有武昌道（武昌、汉阳、黄州三府）、下荆南道（鄖阳、襄阳二府）、荆西道（承天、德安二府，承天治钟祥，德安治安陆）三道及上荆南道的一半（荆州府）；属今湖南省的有上湖南道（永州、衡州二府及郴州）、下湖南道（长沙、宝庆二府）、湖北道（常德、辰州二府及靖州）三道及上荆南道的另一半（岳州府）。^③

州县立官学始于北宋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举措之一，新政

① 详见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5页。

② 详见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

③ 详见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4页。

失败后虽有反复，但州县立学却逐渐成为传统。宋代湖北地区官私学与书院都较兴盛，三十多个州县立官学，以武昌、蒲圻、松滋、兴国办得最好。私学发展也很快，据陆游等记载，沙市、松滋一带民间聚徒教授群童、挟书诵书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一些地方官很重视教育，倡导官私学的兴建，如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在北宋哲宗时被贬知随州，他在任内大兴儒学教育，整顿吏治。宋仁宗时狄栗为谷城县令，修孔庙县学，影响甚大。南宋宁宗时朱熹门生黄干知汉阳军，亦兴校重教。宋代湖北有名的书院有黄州河东书院、荆州南阳书院、公安竹林书院、麻城万松书院、武昌（今鄂州）南湖书院、江夏南阳书院、蒲圻新溪书院等。元代庙学兴盛，孔庙与路、州、府、县学建在一起。元代湖北的官学与书院得到发展，其中有二十三所书院，多在宋代书院的基础上重建或改建而成，规模有所扩大。书院一般建有礼殿（孔子殿）和祠堂，后者祭祀所崇奉的先贤，如周、程、张、朱或程门大儒等，或“四祠”或“五贤”或“七贤”不等。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湖北境内各府、州、县基本上都设有官学，又有社学、义学兴起。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湖北境内共修复前代书院四所，新建书院七十四所，共有七十八所。明清时期湖北出现的很多书院，是怀念宋代儒者的遗惠而建的，如宜昌的“六一书院”与光化的“文忠书院”是为怀念欧阳修而建的，宜昌的“墨池书院”是为纪念苏轼而建的，荆门的“象山书院”是为表彰陆九渊的德政而建的，郢阳的“五贤书院”是为了继承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理学而建的，谢枋曾刻苦读书于兴国（今阳新），后人为纪念他而修建了“叠山书院”。^① 嘉靖、万历年间曾多次禁毁书院，

^① 详见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44、385~391页；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7、605~607页。